

# 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八）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

## 4画像

我国以石头作材料所雕刻成的图象，可以粗分为两大类：一为画像，一为造象。两者虽然都有形象，但一为平面，一为立体，差异昭然。

所谓画像，主要是指图象为平面线刻之石刻，无论其内容的性质如何，从技术上讲都可列入画像一类。

我国石刻画像的出现，概言之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有丰富的石料为前提，有成熟的刻石技术为条件；第二、社会的需要，促使画像石刻的产生。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山东画像石为例加以具体说明。根据初步的了解，山东已在六十多个县出土过画像石，占全省县数的一半以上，但分布不平衡，主要在鲁南地区（即济宁地区的嘉祥、金乡、鱼台、微山、汶上、济宁、曲阜、邹县、滕县等地），临沂地区（如平邑、费县、临沂、苍山、莒县、沂南、沂水等地）次之，泰安、济南、昌潍地区也有发现，鲁西南、胶东等地只有少量出土。

从上述分布情况看，鲁南地区数量多的原因，首先，鲁南地区主要位于山陵地带，该地分布着很多不太高的山丘，这就为画像石刻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正因如此，历来以靠

山采石为业的地方，也就出现了一大批石刻工匠，从而为石刻画像的制作创造了技术条件。其次，鲁南地区在历史上就是经济较发达之地，其东边为琅琊国、东海郡，西边为鲁国、任城国、山阳郡，北边画像石较多之地为东平国、泰山郡与济南国北海郡等。这些地区在先秦为齐鲁之邦，经济文化一向比较发达。鲁南的汶、泗、沂、沭等河流地带，土地肥沃，水利发达，加上冶铁、煮盐、纺织等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为当时地方统治者和富豪之家的发财致富创造了条件。因而在东汉时期，这些地区的豪强地主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和加强。仲长统（山阳高平即今邹县西南一带人）曾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君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后汉书·仲长统传》）这些都为当时厚葬之风创造了条件，也为画像石刻的出现提供了经济基础。再次，政治思想上的需求是画像石出现的直接动机。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已逐步居于统治地位，汉武帝采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是其明显的反映。山东是儒家发源地之一，鲁西更是孔孟的家乡，当时在这里出现过许多经学大师，如鲁国的韦贤（邹人）、韦玄成父子，以明经而位至丞相，当时就有“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的说法（《汉书·韦贤传》）。所以，儒家学说对山东有很大的影响。山东画像石中有许多孔门弟子及经师讲经授徒的场面，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重“孝”，而“孝”的突出表现之一，则是奉行厚葬，当时更有人通过厚葬来博取“孝悌”的美名。所谓“崇飭丧纪以言孝，盛飨宾客以求名”（王符《潜夫论·务本篇》）所以，在东汉时，厚葬之风十分盛行，刻象于石，树石于墓，也就是这些地主阶级分子崇功好名，厚葬尚饰的结果。正是这种思想促使了汉代画像石的大量出现和发展。山东画像石产生的原因，在南

阳地区也大体相似，四川等地亦然，因而是有普遍性的。

我国画象石分布的情况，据出土材料分析，主要在黄河、长江流域，尤其在以下四个地区更为普遍。（一）山东鲁南和江苏北部地区；（二）河南南阳和湖北襄樊地区；（三）四川中部地区；（四）陕北与晋西北地区。

在这些地区，画象石的内容，虽有各自的特点，但大体上是一致的，下面以南阳画象石为例，可以窥见画象石面貌的一斑。南阳画象石，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了一千多块，其中仅在南阳汉画象馆陈列展出者就达二百多石。其内容约可归纳为五类。（一）反映当时生产状况的图象，如农耕、纺织、冶铁、煮盐；（二）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图象（尤其是关于地主阶级生活的更多），如楼堂亭阙、车骑出行、收租庖厨、宴享乐舞、田猎嬉戏等等；（三）反映历史题材与历史故事的图象，如狗咬赵盾、伯乐相马、三桃杀二士、鸿门宴、孔子见老子等；（四）反映神话故事和封建迷信的图象，如嫦娥奔月、后羿射日、东王公、西王母、羽化升天等；（五）反映天女、动植物等的图象，如各种天象图、植物图等。

关于画象石的技法，现在虽有八法、六法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实际上只有两大类。一为线刻绘画（也有称拟绘画者，代表作品如山东孝堂山郭巨石室画象、武宅山武梁祠画象等）；一为浅高浮雕（也有称为拟浮雕者，代表作品如南阳画象石等）。

线刻绘画类，还可细分为：（一）线刻（即图象全部为阴线条构成）；（二）凹面线刻（即图象轮廓以内铲刻成凹面，再用阴线在凹面上刻划细部）；（三）凸面线刻（即图象轮廓为凸面，轮廓以外则减地）等三种类型。

浮雕绘画类，也可细分为：（一）浅浮雕（又叫剔地浅浮雕，它是在浮起的图象轮廓上用简炼阴线钩划图象的细部，轮廓外往往有剔地后留下的横或竖线纹）；（二）高浮雕（即图

象弧面突起较高，细部刻出起伏，立体感强烈，但仍在一平面上，与立体雕塑与造象有质的差别）；（三）透雕（即图象的某些部分刻透镂空，有些近似立体圆雕，但主体仍在平面上）等三种类型。

两种技法虽有不同，但基础都系线刻。这种技法在汉画象石产生以前已存在，它是我国古代绘画的特点和传统之一。它在汉画象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以后更发展成为中国绘画的“骨法”。

我国最早的石刻画象，据现在所知，是在江苏连云港市郊发现的岩画遗迹，距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这组岩画位于连云港市郊西南九里的将军崖下，海拔20米。在长22.1宽15米的平整光亮的黑色岩石上，刻有人物、农作物、兽面以及各种符号，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反映农业部落社会生活的石刻画面（见《人民日报》1981年4月6日）。它线条粗率劲直，作风原始，对历史、考古、民族学、艺术史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汉画象石的最早者，则要算山东沂水鲍宅山的石刻画象，时间在西汉昭帝元凤年间（公元前八〇至七五年），其次为《廙孝禹刻石》上首的立鹤画象，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刻。东汉时期，画象盛行，数量巨大，四大地区的出土量约有数千件之多。以后各代画象石，虽不及汉画象十之二三，但续有所作，量也不算太少，亦是画象石刻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画象石资料，经过几十年的收集，已有相当的数量，到目前为止，所收藏的画象石拓本已有一千七百种左右，近三千三百件（张、册、轴）。

关于这部分拓本（或拓片），从递藏关系看，除其中一部分为北京图书馆零星征集和传拓以外，其中相当一部分则是过去的著名收藏家长期积累后逐渐归到图书馆的。如曾经为乾嘉时期著名校刊家顾广圻收藏、继为“铁琴铜剑楼”瞿家收藏、最后为了惠康所有，然后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的画象就有21种23张；

清末大收藏家陈介琪(簠斋)、端方(陶斋)、梁启超(饮冰室)等收藏的画像也有相当的数量;近人则更多,如湖北陆和九藏的画像有164种165张;天津缪纪珊(铁如意斋)藏的画像有25种68件;傅惜华(碧渠馆)旧藏的画像有167种484件;孙文菁旧藏的画像有100件,以及田伯英等在解放初期捐赠的部分藏品。

至于这些画像石所涉及的地区,也很广泛,尤其四大地区更是比较集中,如山东嘉祥武宅山武家各祠有159种429张;山东济宁两城山有44种44件;山东肥城孝堂山有29种29件;山东滕县有92种111张;江苏徐州茅村有21种20张;河南南阳有42种144张;河南嵩山有24种31件;陕西绥德有29种29件;在四川采访时,一次就收集8种8件。此外,对各地区各时代图象零星收集者就更多。现在,将其中一部分比较好的拓本例举如下,以见一斑。

(一)《廙孝禹刻石》。上部为立鹤画像,下部为刻字。刻字内容,右行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左行为“平邑〔圜〕里廙孝禹”。最早拓本为同治庚午前本。其本,在刻字旁无官、刘两家刻跋。马衡(字叔平)曾收藏一本。以后重入土中,于同治庚午(九年,公元1870年)再次出土,为宫本昂、宫昂等发现。石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北京图书馆藏有同治年间重出之拓本三种,长均136、宽45厘米左右。其中一种,最先为李山农所有,钤有“李氏山农藏石”印,后归梁启超,钤有“任公”、“饮冰室藏”等印,并有梁的亲笔题跋,上首题:“廙孝禹刻石”,下题为“石以同治庚午出土于泗水,旋归李山农,此拓有李山农藏印。乙丑二月启超记。”另二种,亦均为梁启超所有,不过一种有题跋,一种无题跋。有题跋者,文为:“初出土拓廙孝禹碑,乙丑二月启超题藏。”钤“梁启超”、“饮冰室”等印。

(二)武氏祠画像和题字。武氏祠是武氏家族墓葬祠堂的总称,位于山东济宁地区嘉祥县武宅山北麓,坐南向北,包括武荣、武梁等四个祠堂和双阙。技法以凸面线刻为主,减地后留

下的是整齐的竖线凿纹，共约五十石。时代约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后的几十年间。北京图书馆藏品有三种较佳。一是武荣祠画像，长197、宽78厘米，一张，内容有各种职官图、战争图等，并有榜题八则，为顾千里等各家旧藏，钤有“顾氏所收石墨”、“瞿氏鉴藏金石记”、“伍氏图书”、“曾在伍贻堂处”、“贻堂过眼”等印。嘉庆道光拓本。二是武梁祠画家，三幅裱一册。内容为帝侏、曾子、丁兰等。有翁方纲、洪范、邵锐等人题跋。钤有“翁方纲”、“覃谿鉴藏”、“石农书画之印”“茗生题记”等印。三是武氏祠榜书，一册，长31、宽28厘米，为翁方纲油纸钩摹本，前有翁隶书题“武梁祠字”四字。每一则榜书旁都有翁的珠书校记及跋，并丁巳（嘉庆二年）十一月一日题记。钤有“石墨书楼”、“方纲”、“覃溪艸稿”、“东卿过眼”等印。

（三）孝堂山郭巨石祠画像。在山东肥城孝里铺，刻于墓室前石祠内壁上。建于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刻历史故事、神话故事、以及宴饮、庖厨、舞乐、杂技、战争、出巡、狩猎等活动场面。北京图书馆藏有拓片一张，长193宽67厘米，有神话与历史故事，庖厨、杂技动物等图象，其中受刑图等，更是现在编写我国法制史的重要资料。嘉庆道光拓本。

（四）文叔阳食堂画像和题字二种。石在山东鱼台，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八月十九日刻。北京图书馆拓本中较著名者，一是饮冰室旧藏初拓本，有梁启超题跋，文云：“石初出土藏马氏，后为端陶斋所得，陶斋死流出厂肆，有欧人贵乐尔者鞏去矣。此石有马氏藏印，盖出土拓也。乙丑二月启超。”钤“启超”、“任公”、“饮冰室藏”等印；二是题字摩本一册，长32、宽19厘米，前有莫友芝题记，并钤“莫氏子偲”、“绳孙钩摹”等印。

（五）射阳画像。石在江苏宝应县。北京图书馆藏拓片二种。一道光拓，二张，长125、宽49厘米，内容为孔子与老子相

见、庖厨、朱雀、武士等。顾千里旧藏，钤“铁琴铜剑楼”印。二乾隆嘉庆拓本，一轴，长127、宽52厘米，有何璠玉题跋，曾为江都汪喜孙等收藏，后又为梁启超所有。钤有“何璠玉印”、“江都汪氏有此石”、“汪喜孙信”、“饮冰室”等章。

(六) 三阙画像。阙在河南登封嵩山，为太室、少室、开母三石阙的总称。北京图书馆藏拓本中，以少室石阙画像最为有名。一轴，长285、宽26厘米，汉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三月二日刻。前有陆绍曾隶书引首题，后尾有乾隆吴騫、嘉庆吴东发、道光曹言纯等三人的题跋，并钤“曹言纯印”、“沈树鏞郑斋鉴藏印”、“均初审定”、“沈树鏞读碑记”等印。

(七) 滉池五瑞图。石在甘肃成县，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刻。内容为青龙、白虎、嘉禾、木连理、甘露、承露人等。仇靖隶书。北京图书馆藏有顾广圻旧藏三种。一为乾隆嘉庆拓本，“黄龙”二字尚存，钤有“顾氏所收石墨”等章，极为珍贵。其余二种均为道光拓本。

(八) 李氏墓门画像。北京图书馆有二种较佳拓本。一为硃拓，一轴，饮冰室旧藏。一为墨拓，长68、宽47厘米。同治十一年拓本。首题：“汉升八将佐命功曹东藩琴亭国李夫人灵第之门”。后有王懿荣穀云臆等人题跋，钤“镗宠郡辕固胃”、“小网川”等印。

(九) 晚期画像。这是指汉以后的画像石，这种材料较多，拓本也不少，现举二例。一为观音像并赞，道光拓本，一张，长57、宽37厘米。在江苏吴县，宋代刻，慈受撰赞，后有达受（即六舟和尚）草书跋，钤“六舟所得金石”、“顾氏所收石墨”、“瞿氏鉴藏金石记”等印。二为颜真卿像记，乾嘉拓，一张，长122、宽51厘米。石在陕西大荔，唐重撰并记，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刻。钤“顾氏所收石墨”、“铁琴铜剑楼”等印。

上述只是例举北京图书馆藏画像石中之一、二而已。

（执笔人：徐自强）